

芟蒲青果集

黄永年 著

中华书局

序

1983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投到业师黄永年先生门下攻读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同一年黄先生还招收了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学生。先生同时开授两个专业课程，按照安排，两个专业学生均需上他亲授的各门课程。其中之一便是“唐史专题研究”，课堂上先生讲到当年他就陈寅恪先生关于“狐臭”与“胡臭”的看法撰文补正的往事，这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表示很想拜读先生的这篇文章。下一次上课时，黄先生带来了一个大大的剪报本，多篇文章剪贴在了一本旧期刊上，由于经历了几十年时光，纸色已略泛黄。黄先生神色庄重地交给我们，并叮嘱道：“这里的文字都是我早年所写，是你们太老师童书业先生亲手编定，书名《茭蒲青果集》也是童先生所题，看时一定仔细，千万不要伤损。”1946年先生入上海复旦大学史地（后改历史）系读书，这些文字即是他于此年至1949年在校学习期间所撰论文之结集。说实话由于当时专业基础有限，不少文章读后时觉懵懵懂懂，只是感慨先生读大学时水平之高及文笔之老辣，比我等这些号称研究生者不知高明多少。

感谢中华书局决定将黄先生的这部遗著付之枣梨。先生哲嗣寿成君囑我作序，尽管才疏学浅固难膺此重任，诚感惶恐，但身为弟子又不容推辞，只得硬着头皮勉力为之。由此机缘，在时隔近30年后，得以再次展读先生早年的这些文字。先生的学问至今仍难尽窥涯岸，在此仅谈谈我就此《集》所见先生早年治学追求和方法的些许体会，希望对读者了解先生的学术能够有所助益。

一是学术眼光之新锐。《集》中诸文，在选题上多具新义。先生夙以治中古史著称学界，唐史研究堪称卓然成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久已为人共知，自勿庸置喙。先生早年因深受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诸师的影响，曾在先秦史上下过不小功夫，有关这一时期的典籍多已熟读，而以后之所以转治中古史，个中缘由亦曾言及，惟不愿以此遭人误解为总是在老师的羽翼之下，遂改辟他径。于此仅择《集》中研治先秦史之两例略陈管见。平王东迁之后进入春秋时代，由于周天子地位衰落，诸侯蜂起，黄河下游各国间的攻伐盟会，支配了整个春秋初年的大局，《鲁隐公时代的鲁国外交》一文，以当时诸侯国中地位最高，足以举足轻重的鲁国为中心，就隐公在各国间的纵横捭阖，展现这一时期政治风云，其构思取意之精妙，今天读来仍备觉新鲜。《〈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则承童书业先生之论而补抒己见，由于几十年来城址考古的进展及新出材料的发现，其认识能否成为定论姑妄不论，仅就此春秋时期吴越都城之题目而言，至今仍受到学界关注而不断重提即可显现其价值，套用时下流行语可谓颇有问题意识，而这种意识也正是今日所强调的学术创新精神。

二是治学兴趣之广泛。黄先生学问以广博称，在晚年曾说过

“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由于历史学、文献学方面的成绩既多且突出，人多视先生为史学兼文献学大家，实则他在文学等多方面亦具极深的修养。《古本小说集成》系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一套大型古代通俗小说总汇，计收书400多种，精装为近700厚册，堪谓煌煌钜制。一日在资料室看到先生正在陈放此书的书架前随意翻阅，不经意说了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这些书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从前都看过。”据我所知，现在专治古代文学的大学教授也远非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先生读书之多且广非常人可比，加之超常的记忆力，因而在治学上方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这一特点在此《集》中已见端倪：以史学论则上起商周下迄近世；以文学论则及于唐集唐诗；版本学有文专论宋槧；碑版则至于汉唐名刻；名物考订多集中于当日的古器物学诸如明器一类；另有多篇可归诸时下甚热之社会史；等等。先生早年在学术上即拥有之恢弘格局，不能不令我辈汗颜，今日仍生难望项背之叹。

三是史料运用之娴熟。通览全书，黄先生当时已具有的深厚文献功底当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之处。先生早年即对传统文史之学产生浓厚兴趣，在闲谈时提到若干典籍常常脱口而出“我当小朋友时读过”云云，这令我等弟子辈惊羨不已，不客气地说，此等书籍当今遑论大学生，甚或研究生也未必认认真真读过。由于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多得精义，因而《集》中诸文所引各类文献，皆如烂熟于胸，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妥帖有致，足见其这一方面的功力之深厚，这当然不是时下某些青年学人多仰赖互联网及电脑检索而徒事抄撮成文者可比。先生当日的苦读不辍于此可以想见，这无疑也

奠定了其日后学问大成的牢固根基。

四是考订辨析之缜密。黄先生早年得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先生亲炙，诸师无不以精于考据而著称于世。先生在臧否当世学界人物习以“做得来考据文章”作为评价准的，培养学生亦极重视这一方面的训练，时时强调考据学问乃文史之学的根基。先生久谙个中三昧，其素养之深厚堪称比肩乾嘉诸老，当世少有其伦。因古明器研究多关涉名物考订而更见功力，《集》中此类文字读而即知。

五是思虑谋度之周瞻。在此仅举一篇读书随笔式的小文《故事传说的一个例》略窥一斑。先生以《吕氏春秋·察传篇》中为人熟知的“丁氏穿井”事破题，复举用《晋书》、《太平御览》引晋宋志怪《灵鬼志》、《幽明录》及《太平广记》所载之小故事绌绌端绪，层层深入，不仅还原了其本来面目，并进而由此得出三点教训：“第一，《晋书》前人讥其好采小说，近人赞美此点，谓其能保存当时风俗的史料。这种眼光自然不错，但是要知道《晋书》已不是原始的史料，其可信价值，决在《世说新语》及《太平御览》、《广记》所引的晋宋小说等之下，引用时不可不十分谨慎；第二，二十五史的记载，其成分至为复杂，错误荒谬颠倒脱漏的地方，一定多不胜数。我们必不可如过去的学者，把正史盲目的尊崇，斥此外的史料为‘短书小说’而不顾；第三，研究历史所依据的是史料，而引用史料之先，必将史料经过缜密的审查，以确定其可信的程度。”这种举一反三、见微知著的识见实在令人感佩，先生不惟勤读书，更可谓善读书者也。先生在“附记”中并不忘申明“本文引用的《晋书》据开明二十五史影印武英殿本，《太平御览》据鲁迅《古小说钩沈》转引本，《太平广记》据黄晟重刊明嘉靖谈恺本，其中容有脱误，惜

求书不易，不能广求善本来校正了”。则足见其终身为学谨密的一贯风格。

六是质疑权威之勇气。试想黄先生是时以二十出头之年，初涉学术之资，洵属新出茅庐之无名小辈，虽其读书撰文已具发现不足并进而辨析是非的眼光和能力，但在学术上欲真正有所成就，恐怕更需要的还是对于所谓权威不迷信不盲从的心态。《集》中所收，不仅有就其师童书业先生的补证之作，更有对当时已蜚声学林的钱穆、陈寅恪、徐中舒先生等诸大家的辩驳深究之文。尤其是针对近世古器物学之奠基人罗振玉名作《古明器图录》，即直截了当地指出其命名、分类及体例诸方面的多处疏失，在在有据，令人叹服。文末复一针见血地说：“罗氏这部《古明器图录》，平心而论，究竟还不失为研究明器的先驱；所谓粗心，草率，不学，武断，也正是一般玩古董者的通病。无如后起的学者，震于罗氏的大名，罗氏一言一语，都成为他们的金科玉律，于是《古明器图录》成为明器学的经典，而三十年来的明器学遂无寸进（例如罗氏随便误拟的一个‘魅头’的名称，竟会承用了三十年而不变）。可见我国一部分的学术界是如何迷恋着权威！可见权威在我国是如何容易地支配了一部分的学术界！”这就绝不是仅对其时已负汉奸之名的罗氏的批评了。套用西哲名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反观当今学界，这种勇气和精神仍应大力提倡，期以真正成为治学者奉为圭臬的不二法则。

《集》中诸文虽以考据见长，而考据之学如今或有锱铢短钉之讥，此见之短长姑置不论，仅就此《集》整体而言，文中不时崭露的又何尝不是治学者应具有的大眼界与大格局！

黄先生青年时代的以上特点，实则成为他终身治学的基本范式，

也正是他学术研究能够建树不凡成就的最可贵品格。此《集》的出版，不仅可以概见黄先生早年的学术见地，亦应成为今日从事学术研究者的一面镜子，我以为后者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学术乃天下公器。《集》中诸文所见，或已堪成定论，或可为一家之言，或见仁见智尚容商榷。当今大学在读学生所撰文字多冠以“习作”之名，因此对先生当年之论，似不宜苛求完备。实则先生早年的某些见解，其后又续有修正，如《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文中引《太平广记》“唐参军”条语“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案云“白”、“康”均系胡种姓（“白”为龟兹姓，“康”为唐代昭武九姓之一），这一点在为我等授课时已重解为“赵”、“张”为匈奴入中原后之改姓，因其在先，故时人谓之千年；“白”、“康”二姓较晚近即为五百年云云。这无疑后来更趋成熟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于书名，尚可补说几句。当年曾询及先生，实得名于旧日位于常州茭蒲巷和青果巷交叉路口的居处，其时并用作室名，而无他深义。

以余小子之根柢，何足与论先师的学术，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书此权作重温先生旧作的点滴体会，管窥之见不尽惬意，敬冀诸方家并读者教正。

受业贾二强

二〇一二年五月沐手拜序

辑 一

略论文王伐殷之史实

治商周之际之史事，其最可信据之史料，在理论上当首推甲骨文。惟事实上甲骨文中虽有有关周之纪事，然多为第一期武丁时之物，于商周之际无涉。周代金文之传世者，武王时仅得二器，而文王以前无闻焉，即此二器之文，亦渺有涉及史事处。故论商周之际之史事，自不得不以纸上文献为主。

纸上文献之时代最早，且最具史料价值者，自莫若《诗》、《书》。《诗》之《大雅》、《周颂》，多记文武之勋绩，虽属歌颂功德，不尽实录，然至少当有若干史实为根据。《书》之《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为周初之文告，比较金文，知其确为当日之真笔，实属第一等之原始史料。故在今日言周初史事，自舍此二者而莫属。

读此《雅》、《颂》及《周诰》八篇，可得一重要之观念，而此观念，适与旧日之常识相背者，即其中之称扬文王，实远过于武王，一若克殷之伟业，非武王之力，而系文王之功者，是也。夫《雅》、《颂》之少称武王，尚可诿为篇章散佚不备所致。独《周诰》之后

四篇《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则为成王时作；而前四篇除“《梓材》一篇，章句错乱，条理不备，当是散简凑合”而成者外，《大诰》、《康诰》、《酒诰》三篇，据近人考证，亦为周公称王时作^①。然则周公、成王于其文告中必没其父兄武王之功绩，而称扬其祖父文王之勋业者，岂非文王实有伐殷之劳绩，而武王不过适会成功，故不足大事夸张耶？

案古籍所称，文王本有“受命”之说，《康诰》曰：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大雅·文王》曰：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宜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大明》曰：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夔伐大商。

《皇矣》曰：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维此王季，帝

^① 均见童书业师《大诰康诰酒诰著作时代考》。

度其心……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文王有声》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周颂·维天之命》曰：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金文中亦有文王受命之说，康王时器大盂鼎曰：

丕显攷（文）王，受天有大令（命）。

案近有人以甲金文中无“命”有“令”，因谓古“令”“命”一字，凡古书中“命”字皆当作“令”字解^①，其说至当。所谓文王“受令”，实即文王承受上天“上帝”命令之谓耳。至天之命令为何？观《诗》、《书》之文自见，举凡娶妇，生子（其目的在生子以伐商），与夫伐密，伐崇，无一非出于天之命令，而此命令之最重大者，则为“殪戎殷”，是也。

于此有一问题需待解决，即“殪戎殷”一语究属何解？案文王成功之见于古籍者：《大雅·绵》曰：

混（昆）夷駉矣，维其喙矣。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

^① 见《性命古训辨证》上卷。

《皇矣》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

《书·西伯戡黎》曰：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皇矣》又曰：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
以伐崇墉。

《文王有声》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汉人之书，如《史记·周本纪》曰：

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文王〕明年伐犬戎
（即昆夷）。明年伐密须（即密）。明年败耆国（即黎）。……明
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

《诗·大雅·文王序疏》引《书大传》曰：

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邶。三年伐密须。四
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盖即本《诗》、《书》以为说，而均不载文王直接伐殷之实。夫
“耆在上党，鄂在野王，〔伐之〕则所以图纣，崇盖纣党最大者，
故最后伐之”^①。此等武功，本为伐殷之最后目的而设。故谓
《康诰》之“殪戎殷”即指此数武功言，本无不可。惟《墨子·
非攻下》尚曰：

^① 见吕思勉师《先秦史》。

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则明言文王有直接伐殷之事实。《太平御览》卷八三引《竹书纪年》亦曰：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案《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引《竹书纪年》曰：

文丁杀季历。

则帝乙时季历已死，伐商之周人，非文王而谁？是在战国之时，尚有文王伐殷传说之存在^①。然后知《康诰》“歼戎殷”一语，实指文王之直接伐殷而言。徒以为《雅》、《颂》所失载，汉人之书亦因之而不记，于是此段辉煌之战绩，遂沉埋三千年而弗为人知矣。

案文王之伐犬戎、密须、耆、鄂、崇诸战役，武功彪炳一时，克殷之计划，已十九完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势，盖定于是。即此而论，已堪称周之第一名王。况复有躬自伐殷之盛举，《诗》、《书》之称扬歌颂而不置者，理固宜然矣。

克殷之事业，既十九完成于文王之手。武王续立，牧野一役，不过席文王之余威，而居其成功而已。《周颂·武》曰：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
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① 《墨子·非攻》为战国时书。《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史官所作，其记春秋以前事当出追记，钱穆有此说，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序中。

是也。又古籍多称武王为太子发^①，《史记·周本纪》曰：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后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此虽未必史实，然实有传说故事以为本^②。而此称传说故事之所以产生者，殆亦以武王伐纣，实承文王之旧业故也。

窃谓周之克商，启之者文王，成之者周公，而武王惟居攻克殷都之功，于其间实仅占一不甚重要之地位。若以后世史事拟之，周之于商，犹清之于明；文王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周公为多尔衮或康熙帝，而武王则福临一流人物也。此比拟虽似不伦，然苟自大体观之，当以吾说为不谬也。

（原载《东南日报·文史》第一三一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① 《书大传》引《书》曰：“太子发上祭于毕。”《孟子·离娄》赵注引《书》同。《白虎通·爵篇》引《尚书》曰：“太子发升于舟也。”《周礼·太祝疏》引《泰誓》曰：“太子发拜手稽首。”《诗·文王疏》引《我应》曰：“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终之后，但称太子发，河洛复告，遵朕称王。”《太平御览》卷一四六引《尚书·中侯》曰：“予称太子发，明慎父以名卒考。”《逸周书·文傲》曰：“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文传》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郟，召太子发曰。”《墨子·非命下》曰：“于去发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序》《周书太誓疏》曰：“案去发未详，或太子发三字之误。”

^② 《楚辞·天问》：“载尸集战何所急。”可见此传说在战国时已流行。

鲁隐公时代的鲁国外交

——春秋列国治乱兴衰丛考之一

当春秋时代的开始，西方的统治势力已随西周的灭亡而崩溃，东方黄河下流的国家便自然地活跃起来。他们相互之间的攻伐盟会，便支配了整个春秋初年的大局。其中重要的国家，有宋、卫、齐、鲁、陈、蔡、郑七国。七国之中，外交最灵敏，手段最厉害的，当然是郑国。而国际地位最高，足以举足轻重的，却当推鲁国了（关于这点，可参考童书业先生《春秋初年鲁国国势考》，载《益世报·史苑》第二十二期）。

但是鲁国的国力虽强，他的外交政策，在春秋以前，却未必怎样高明。试看《左传》之中，所保存的春秋前的鲁国外交史料吧！当时鲁国的国君是鲁隐公的父亲惠公，隐公元年传说：“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到这时才“始通”，可见此前宋是鲁的敌国。隐公六年：“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到这时才“始平”，可见此前齐也是鲁的敌国。隐公十一年：“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

于狐壤，止焉。”可见隐公初年以前，郑也是鲁的敌国。只有一个卫国，据隐公元年传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卫侯来会葬。”知道他与鲁国还保持着相当的国交。（此外陈蔡两个次等国，在春秋前与鲁没有什么正式交往的记载。不过据隐公四年传“于是陈蔡方睦于卫”看来，陈蔡是卫的一党，则在春秋前，或者与鲁也不致会有什么冲突。）这样看来，黄河下流的大国中，倒有宋、齐、郑三国，与鲁站在敌对的地位，能够与鲁国保持友谊的，只余一个卫国。所以春秋前的鲁国外交，可说非常孤立，虽然不致弄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但也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了。

因此当进入了春秋时代，惠公的儿子隐公即位以后，便首先要打破这外交的僵局，以挽救孤立的危机。第一个着手联络的便是邾国，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原来这邾国是介于鲁宋间的小国，也可说同时是鲁宋的附庸，在这时大概邾宋关系比较近，隐公的所以求好于一个附庸小国，其实只是为拉拢宋国打算，果然就在同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鲁宋之间正式地和解而携手，加上了鲁卫的友谊（宋卫之间大概也有相当的国交），与陈蔡对卫国的关系，于是鲁宋卫陈蔡联合起来，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阵线（此外隐公二年与戎会盟，又与纪结成婚姻之好，也都是隐公外交的成功）。在隐公四年：“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大概鲁国一向抱着谨慎的中立态度，所以鲁隐公不肯参加伐郑的战事，似非与宋公的交情不够。只要看本年“春，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夏，